

杨周翰作品集

攻玉集

镜子和七巧板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杨周翰 著

文
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攻玉集

镜子和七巧板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杨周翰 著

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杨周翰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易强 马晓玲

装帧设计：蔡立国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mm 1/32

印张：16.5 字数：364,000 插页：2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ISBN：978-7-208-13613-7 / I · 1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 / 杨周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杨周翰作品集)

ISBN 978-7-208-13613-7

I. ①攻… II. ①杨…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9882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出版说明

杨周翰先生（1915—1989）是中国杰出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者，卓尔不群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杨先生提出的“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深影响了后辈几代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东西方文明越来越多地注重彼此交流、互相借鉴的当下，杨周翰先生前瞻性的眼光和恢宏的视野，其价值愈发凸显。

《杨周翰作品集》（全六卷）是杨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结晶，共收入著作4种，译作8种。卷目如下：

第一卷 《埃涅阿斯纪 特洛亚妇女》

第二卷 《变形记 诗艺》

第三卷 《蓝登传》

第四卷 《亨利八世 情敌 我的国家》

第五卷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第六卷 《攻玉集 镜子和七巧板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杨先生精通英、法、拉丁等多种语言，第一至四卷收录的是他从拉丁文、英文译出的经典译作，优雅流畅的译笔，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几十年来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灵魂；第五、六两卷

是他在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论述，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提出诸多鲜明创见，奠定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的坚实基础。杨周翰先生不畏艰辛的学术热情、究本求源的治学态度，令后辈学人感佩。

杨先生的作品译作、著作兼有，中文、外文错杂，题材广泛，写作和出版时间跨度大，编辑体例亦不统一，我们此次整理，以依循底本、尊重原作为基本原则重新编排，对明显的排印错误予以改正，并对格式、标点、数字用法等做了技术性的统一。

目 录

攻玉集

前 言 / 3

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 / 4

莎士比亚的诗作 / 28

莎士比亚如是说 / 47

十九世纪以前西方莎评 / 57

二十世纪莎评 / 66

百尺竿头，十方世界 / 84

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 / 94

菲尔丁论小说和小说家 / 115

斯末莱特和他的《蓝登传》 / 123

新批评派的启示 / 139

艾略特与文艺批评 / 152

从艾略特的一首诗看现代资产阶级文学 / 162

镜子和七巧板

序 / 173

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 / 175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 / 185

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 / 195

历史叙述中的虚构 / 205

维吉尔和中国诗歌传统 / 228

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 / 238

《李尔王》变形记 / 24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书后 / 259

莎作内外 / 265

中西悼亡诗 / 316

巴罗克的涵义、表现和应用 / 329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Preface / 345

Virgil and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 347

King Lear Metamorphosed / 358

Speculation on a Possible Source of Shakespeare's Dramatic
Anomalies / 374

Milton's "Canie Waggons Light": A Note on Cross-cultural
Impact / 386

Dao-wang Shi (悼亡诗), or Poetry Lamenting the Deceased
Wife / 411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Chinese and Western Critical Attitudes / 428

Fictionality in Historical Narrative—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 440

Disjecta Membra: Supplementary Remarks / 452

Chinese Theory of Literary Classification / 459

Eurocentrism / 470

攻玉集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3 月初版《攻玉集》整理

前 言

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我想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我们自己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这里收集的十二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写的，因此取名为《攻玉集》。至于写得好或坏，对与不对，那要由读者来评定，从作者来说，只是野人献曝的意思。

这些文章在集成付印前作了一些局部的修改，仍然难免有错误，也希望读者指正。

这本小册子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鼓励下编成出版的，国外文学编辑部陆嘉玉和冯国忠两同志给了大力帮助，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杨周翰 1982.7

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

解放以来，我们在外国文学史编写方面（当然也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力图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阐述外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作家进行阶级分析，注意作家作品在当时当地阶级斗争形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根据反映论，强调文学反映现实，肯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文不想全面总结解放后我们在编写外国文学史中的经验，只想就当前我们工作中个人所看到的几个问题，提出来探讨研究，因为我感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本门学科水平的提高，关系到更好地适应新形势，适应新时期教学和指导青年阅读的需要。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解放后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是从学习苏联开始的。苏联是第一个用马列主义系统地研究西方文学的国家，苏联学者在这方面起了开创的作用。但苏联学者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在方法上存在不少问题，而我们亦步亦趋，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四人帮”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百家争鸣等重大问题上，又混淆是非，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对外国作家，包括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家，一律扣上封、资、修的帽子，一棍子打死。在许多理论问题

上，如人道主义、典型性等，都以“左”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予以否定和歪曲。

随着揭批“四人帮”，拨正他们在文艺领域中颠倒了的是非，回顾我们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我们感到必须从种种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发扬学术民主，我们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工作才能有所进展。当然，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有一个过程，今之视昔一定亦犹后之视今，而认识过程总难免有曲折以至错误。以下仅就五个方面，约略提出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进一步贯彻唯物辩证法，贯彻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精神

我想一部文学史首先要求能做到一个“信”字。我国历史学的传统也历来强调“信史”、“实录”，不仅要求“其事核”，而且要求“不虚美，不隐恶”。“信”就要求符合事实，而要符合事实，就不能有片面性，也就是必须一分为二。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也不能好的都好，坏的都坏。在选择材料问题上，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要从作家在历史上的影响出发，不能凭主观好恶而决定取舍。

反观我们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常常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流派、作家、作品）往往同文学史的表述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情况表现在把历史上进步的作家说得比原来更进步，把一些不那么进步的作家宁可说成反动。这种倾向在苏联某些文学史里已见端倪，如阿尼克斯特编的《英国文学史纲》把英国第一部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主人公说成是“人民之父”，这样就掩盖了此

诗的贵族性质，而诗中其实并未有过这样的提法，相反，在绝大多数场合都称他为“王”、“君主”。这种喜欢拔高的倾向，比比皆是。

对待莎士比亚，这种倾向也是占主导地位，从西方浪漫派评论开始，通过苏联到解放后我国的文学史和评论，对莎士比亚很少有贬词。伏尔泰和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固然是出于时代风尚不同或文学主张不同，未必全对，有时是误解，但是他们不迷信莎士比亚。

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文学流派的评价则反映了另一种倾向，尽量贬低，以至把它们看成一无是处。

过去我们写英国二十年代小说家乔依斯是这样写的：他的主要作品《攸利希斯》以几十万字写了广告经纪人布鲁姆及其妻和青年斯蒂芬一天的生活，写他们精神苦闷，思想肮脏腐朽，没有希望。由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中小资产阶级惶恐失望、厌世，以至仇视人类。前一时期虚伪的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被更为反动的对“潜意识”活动的追求所代替……

这部小说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彷徨的情绪，但是否因此就对它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呢？我觉得正是因为它反映了这种精神状态，因而有极高的认识价值。这类作家之所以能深刻地反映这种精神状态，则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有极深的感受，同时在表达方式上刻意寻求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有形式主义成分）。

极力贬低的倾向往往出于好意，怕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

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1]

青年主要要靠正面理想的教育，把立足点站稳，用分析批判的眼光，放眼古今中外，一切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毒草尚且可以肥田。消极抵挡，“封闭疗法”，自己搞得被动，得不到积极的效果。

文学史（也包括文学评论）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作家提出过高的要求。如对西方四十年代后期迄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评论者认为这些流派纵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丑恶、阴暗面，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腐烂和丑闻已无法掩饰，以至政客们也利用彼此的荒谬丑恶互相攻讦。评论者认为这些流派的作者做些不痛不痒的嘲讽，不能损害垄断资产阶级半根毫毛，不触及本质；评论者并指责这些作家不反映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英勇斗争，却宣扬荒谬是永恒的，人类只有毁灭，因而这些都是反动流派。对历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类似的评价，说他们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我们评论一个作家只能就他所提供的材料来判断。据此，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说，从中学到的东西比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

[1] 《鲁迅全集》1957年版第8卷第350页。

家的全部著作中加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要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具有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是过高的要求。政治上的反动应当同资产阶级世界观区别开来。

我个人感到象六十年代黑色幽默小说如美国海勒的《军规二十二条》总的倾向是揭露性的，应当肯定。尤其是作者的《出了毛病》，态度是严肃的。这部小说距前一部相隔十二年，出来以后评论界大失所望，可能因为里面很少噱头，但这正说明作者思想的深化，这部小说没有什么奇特惊险的情节，平淡地叙述主人公的职业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和其他一些他接触到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他总是处理不好这些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出了毛病”，尽管作者得不出答案来。同样，象荒诞派尤内斯科和贝克特的戏剧，尤其是后者影响空前的《等待戈多》，如果作者仅仅是玩世不恭，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危机有深刻的感受，如果在艺术实践上没有探索精神，也写不出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广泛共鸣、产生长远影响的作品。这类作品就其性质来讲当然是悲观的，但是对我们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值得研究，也不能全盘否定。

我们有时把文学上的不同作家不同流派，写得壁垒森严，泾渭分明，俨然是两个阶级，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如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贵族阶级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敌视，鼓吹忍耐驯服，妄图开历史倒车；积极浪漫主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倾向，往往同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有不同程度的革命要求。这样粗线条的概括不够真实。其实两派无论从阶级地位和思想意识以及文化艺术背景讲都有共同处。像英国的华兹华斯一方面要一分为二，他固然害怕雅各宾专政，脱离了斗争，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也是使他失望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即如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

诗人之间也很不相同，有的文学史就说拜伦的动力是傲慢，雪莱的动力是爱，也许正因如此，才有传说的马克思的论断：雪莱可能发展成为革命者，而拜伦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两派虽有不同，但我们往往把这不同绝对化，而各派成员既有对立又有相同的一面。具体事物应该具体分析。

我们写文学史当然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文学也直接或间接与政治发生关系，但我们往往见到有时执笔人惟恐没有“突出政治”，不能从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我们在分析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时，把主题思想说成是描写一个专制独裁的暴君，由于刚愎自用，经过一场痛苦的经历，翻然悔悟。这部悲剧揭露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利己主义，批判了对权势和财富的贪欲。它还反映了圈地运动所引起的广大农民流离失所的英国现实。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的口表达了他对农民的同情。这样的表述同剧本一对照（且不论李尔转变这一复杂问题），就会发现这里把全剧中的一个“部件”扩大为“主体结构”，考其原因就是这段台词是能够同当时现实政治挂得上钩的。接着，就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批判，说这种同情正暴露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求助于剥削阶级发善心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想法，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维护专制帝王统治的改良主义。

差以毫厘，失之千里。这种分析同剧本所客观反映的情况，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了。莎士比亚同情农民的话，起了一个说明权威与社会正义对立的作用。这出戏不是写怎样把农民从圈地运动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莎士比亚也有不少地方丑化农民群众。至于维护专制帝王统治，作为“专制帝王”的李尔既然悔悟了，也就是被否定了，又如何谈得上“维护”呢？事实上，莎士比亚一贯鼓吹改造封建君主，以便打破封建割据，促进民族国家的形成，有进步意义。